

原子訛詐破產了

李沃夫 著



世界知識社

Вл. Львов
ПРОВАЛ АТОМНОГО ШАНТАЖА

譯自“Знамя” 1954年9月號

原子訛詐破產了

〔蘇〕李沃夫著

錢滋英、傅娟、蔣輯譯

*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428·787×1092紙1/32·1 1/2印張·34,000字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1—13,000 定價：0.12元

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的晚上，美國巡洋艦“奧古斯太號”的無線電報收發員將一份剛譯出的電報送交艦上的一位乘客。當這位乘客收到這個電報時，他竟興奮得立刻吩咐開一個祈禱會，感謝上帝。

這時候，“奧古斯太號”巡洋艦正在大西洋洋面上用最快的速度，由歐洲駛往美國海岸。這位因收到了那份電報而感到興奮的乘客就是美國的杜魯門總統。電文的內容是：清晨八點十五分在日本廣島上空投下一枚原子彈並爆炸了。

那時候，與德國法西斯鬥爭的三大國領袖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所開的具有歷史性的會議剛告結束。蘇聯紅軍已經勝利地結束了它的解放戰爭，同時已在易北河岸和美、英盟軍攜手會師了。遠東方面，在滿洲戰場上蘇聯軍隊也已準備好予日本帝國主義以一個決定性的打擊來消滅日本的軍事主力——關東軍。日本的命運已經被決定了。事實上不再需要任何軍事措施去毀滅廣島的成千成萬的和平居民的生命（何況在廣島並沒有任何軍事工業）；更不需要在三天之後又把長崎數萬平民的生命葬送於第二枚美國原子彈之下。可是事情還是這樣

地發生了。

現在我們知道了關於它如何策劃和如何冷酷實行的許多詳情。這種用盡心機、周密佈置的軍事行動的最終目標並不是日本；他們還有更大的企圖。從美國官方的論調中，我們可以聽到這樣的一種說法：在最初，美國準備原子武器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希特勒在原子能使用方面超越盟國——這種說法更加使善良的歷史家們難以置信。我們也可以拿維·海森堡和阿·漢二人的話來駁斥這種說法。這兩個人都是德國的科學家；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期間，他們曾在德國領導原子能工作（現在海森堡是西德製造原子武器的頭子，已經在替他的美國主子服務着）。他們二人曾說過：希特勒當初原有製造原子武器的企圖，但是這個企圖在一九四二年就像一朵花沒有來得及開放便凋謝了。因為，在一九四二年，德國已經失去了在挪威的重水製造廠（重水為製造原子彈的一種原料）。其次，德國根本就無法認真地開始進行鉅額的採掘及原子爆炸品的生產。阿·漢曾供認：“我們既沒有足夠的原料，也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達到這樣一個目的。”

如此看來，在這種情況下，要拿“德國的威脅”作為藉口簡直是一個謊言，而且是一個包藏非人道的打算的謊言。也曾有不少從各地到美國去的誠實的學者——反法西斯的和愛國的——被這個謊言騙上了鉤；他們有的去自英國，有的去自法國、意大利、丹麥和其他一些當時被納粹所佔領的國家。他們不是移居到美國去的，就是和美國簽訂了合同去參加“曼哈頓計劃”的工作的（所謂“曼哈頓計劃”就是原子彈製造廠的暗稱）。大洋彼岸某些最有權威的政治活動家曾在無意中洩漏過：沒有外國科學家的幫助，美國的軍火廠是絕對不可能製造原子彈的。因此華盛頓科學研究院院長德沃意特不得不公開

宣稱：“如果我們僅僅靠本國科學家的貢獻，我們將永遠沒有原子彈！……”

美國的“曼哈頓計劃”是經過周密佈置的，而且是有目的的。它要達到那歇斯底里的希特勒以前所不能達到的目的，那就是：要摧毀勝利了的蘇聯人民，要奪取世界統治權，要把所有獨立國家以及其他大陸變為供美國壟斷資本擠奶的牛。一九四八年，有一位英國物理學家保·勃蘭凱特，在他的著名的“恐怖、戰爭與原子彈”一書中（該書的內容述及原子能對戰爭和政治的影響）寫道：“在廣島上空所投下的炸彈，與其說是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枚，還不如說它是開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第一枚。這新開始的戰爭，在起初還只是冷戰，但是以後——假使可能的話——甚至是反蘇的熱戰。廣島的陰影將籠罩在戰後所有的國際問題上……。”

這位英國科學家很確切地掌握了事物的本質。但是在勃蘭凱特這本書出版以前不久，美國前任陸軍部長亨·史汀生在他的備忘錄內，竟無恥地露骨地表示：要利用美國對原子彈的壟斷來迫使蘇聯內部產生一種變化，也就是說要使蘇聯國內恢復資本主義制度。這就是史汀生的計劃；他要在這個計劃的基礎上 and 蘇聯進行談判。哈里曼（當時的美國駐蘇大使）事前曾有遠見地勸戒他的同僚不要向蘇聯提出這樣的建議，因此史汀生寫道：“我放棄了利用我們擁有的原子武器來促使俄羅斯內部發生變化的念頭。……”誰還能說得比這個更明顯呢！

華盛頓商人的盤算很簡單。英國工人運動老活動家、“勞工月刊”主編帕·杜德不久以前寫道：“這是作暴徒的一種共通的盤算，作暴徒的在他下手暗殺人之前，總是先尋找為非作歹的機會的……”

華盛頓認為，蘇聯在戰爭結束時，經濟遭到破壞，人力物力消耗殆盡，已是疲勞不堪了。於是便說，蘇聯想在這種情況下集中為建立自己原子工業所需的巨大力量，那是辦不到的。

但只有將來的歷史家才能完全評定蘇聯人民及其科學、技術和文化在原子工業方面所建立的功績之偉大。

對於美國這種威脅，蘇聯政府已經迅速地並且準確地作出了答覆。這件事情發生在杜魯門和他的隨從在“奧古斯太號”巡洋艦的甲板上向天祈禱後還沒有超過三個月。

美帝國主義粉紅色的夢僅僅做了三個月——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九月和十月。就在這三個月中他們印出了許多刊物、小冊子及文章等宣傳品，題目是：“二十世紀的美國”、“將來美利堅世界帝國”以及關於美國的外交政策（這個政策後來作者們稱為“實力政策”）等等。在這三個月中，這位美國總統先生還作了半打以上的演說，包括他在紐約中央公園的演說在內。在中央公園的這次演說中，他宣佈美國堅決打算把世界統治權攫取到自己手裏來。紐約的紅衣主教史培爾曼也響應自己的總統說道：“今後，美國將右手拿着原子彈，左手舉着聖經前進。”在這些演說發表以後不久，一連串國際間的挑撥接着就在羅馬尼亞、伊朗、土耳其和西德等地發生了。這些挑撥的目的是為了要破壞國際間的合作和剛簽訂的波茨坦協定，也是為了要造成一種有利於挑起反蘇戰爭的局勢。

以上是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月間的事。同年十一月六日，全世界接着就聽到了在莫斯科發表的強硬而且響亮的聲音。維·米·莫洛托夫同志在隆重的莫斯科市蘇維埃會議上說：“在我們這個時代裏……當我們也已經能够使用原子能的時代……我們首先應當注意的是技術上的問題。……敵人阻撓

了我們和平創造性的勞動。但是我們要盡力作一切必要的努力。我們將要有原子能以及其他的一切。（全場起立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我們要以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布爾什維克的力量以及強大的蘇聯人民的力量來堅決地完成這些任務……。”

由於這個聲明而首先引起的國際反應，也許就會使那些膚淺的觀察家在思想上產生混亂。

果然如此。在莫洛托夫的聲明發表以後，在美國立刻有一連串的演說、刊物和論文轟動一時地出現了。如果有人埋頭鑽研過這些文章的話，他們頭腦中可能會形成一種印象，就是：大洋彼岸對於莫洛托夫的聲明都抱着懷疑的態度。各種“專家”們——他們中間有並非沒沒無聞的原子健將萊·赫洛甫士，還有那位幹過外交和特務的將軍培·史密斯——曾發誓般地說：“俄羅斯人不要想在一九五〇年生產一枚原子彈，就是在一九六〇年也不可能。”

那麼，我們將怎樣去對付這些叫囂呢？我們將怎樣去對付這些愚昧無知的“專家們”的表現以及他們對蘇聯人民力量那種可恨的過低估計呢？這種低估別人力量的本領甚至超過希特勒那個投機家。

毫無疑問，在這些反應中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委婉點說，美國議員和外交家消息欠靈通，早已成為世間的話柄。但事情的主要本質並不在此。如果把所有這些宣傳叫囂都信以為真，認為是反映了美國上層統治者的真實看法，那就錯了。美國的真正決策者（指康采恩頭子及其代理人這一狹小的幕後集團），從各方面推斷，是並不大相信他們這些大肆叫囂的“專家們”的。由於耽心美國原子壟斷的前途，他們千方百計企圖搞掉蘇聯手裏的原子能，不讓蘇聯握有原子武器和建立原

子工業。於是計劃產生了，而這樣的計劃，無論就其用心之狡猾或就其圖謀之深遠，都是不可否認的。接着，這個計劃實行起來了；而爲了不失時效，它是以“原子”前時代的外交術都自愧不如的那種靈活和速度實行起來的。

二

法國評論家舒·向勃蘭寫道：“當收音機還沒有來得及播送維·米·莫洛托夫的演說的最後幾句話時，英國首相艾德禮和加拿大總理金氏已經在定購飛機票準備立刻飛往華盛頓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也就是莫洛托夫演說發表以後的第九天，杜魯門、艾德禮和金氏的聯合宣言已經在華盛頓發表了。同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貝文和貝爾納斯在莫斯科召開的外長會議上——根據他們的宣言——建議在聯合國內設立一個有關原子能問題的委員會。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由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五國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開始工作了。第一項議程就是：討論蘇聯代表提出的關於立刻完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建議。

六月十三日，當時被任命爲美國在該委員會中的代表——一位年老的紐約銀行家——培·巴魯克，不慌不忙地逐字逐句地宣讀了美國的計劃，作爲對蘇聯建議的答覆。

按照“巴魯克計劃”，必須將原子生產的監督權、一切原子企業的所有權以及世界各國的原子原料都轉移到國際保管之下（即由美國保管）。事實上，這就意味着將所有擁有鈾礦的獨立國家都變爲華爾街的屬地，也就是把蘇聯國土上的豐富礦藏、礦山、礦井，重工業工廠和輕工業工廠——這是蘇聯人民

血汗創造出來的財產——交給美國壟斷集團來支配。那麼，蘇聯的整個工業將變成美國“合法”的間諜活動的目標。並且在偉大蘇聯的領土上，外國情報機關的間諜們將無恥地作起主人來了。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國際管制”、“國際安全”和“防止”原子戰爭的威脅等旗幟下進行的。

許多文件都證明“巴魯克計劃”的草擬人原就想打着這些旗幟來進行這勾當的。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證明，“巴魯克計劃”的幕後主要支持人之一西·艾·湯姆生曾向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報告，其中有一處，湯姆生（他是杜邦系的孟山都公司的董事，這公司在改建一個鈾礦上面就撈取了數十億美元）供稱：

“按照我們的計劃——也就是按照‘巴魯克計劃’——我們可以得到所有俄羅斯的鈾。……全世界所有放射性的物質都將由國際組織來管理，首先將歸我們。……地質小組將在俄羅斯地區內進行勘察。”

以後當湯姆生答覆參議員麥克馬洪的發問時，他絲毫不加思索地宣稱：

“……他們（俄羅斯人）應當同意我們的計劃，讓地質學家自由地進行考察，同時他們還得準備交出基本原料——鈾。”

至於談到禁止和取締原子武器問題，“巴魯克計劃”曾建議授權美國“國際”原子能卡特爾……去改善和積累更多的原子武器！

這批大商業頭子是很現實的政客，他們當然也考慮到蘇聯可能拒絕這個所謂“計劃”的。假使真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們就打算把“破壞原子能的國際管制”的責任推到蘇聯身上；並且要說蘇聯是私藏原子武器的侵略者，從而在道義上孤立

蘇聯。所以美國參議員麥克馬洪說：“誰不友好地同意‘巴魯克計劃’，誰就是侵略者！”“只有一個挑選：不是‘巴魯克計劃’，便是一場‘預防性戰爭！’”——這些話和與此類似的各種花言巧語，用不同的詞句，說了又說。在一九四六年夏季，在華盛頓的辦公室內，或是在美國的反動雜誌文章裏，都可以聽到或看到這種論調。

這些挑釁和煽動已被及時地揭發了，並且已經報以應得的答覆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一日，蘇聯代表安·阿·葛羅米柯在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上提出了詳細和現實的建議。這個建議完全推翻了那些對蘇聯抱有惡意的懷疑者的立足點，他們再也不能毫無根據地責難蘇聯不願讓國際組織來監督原子能了。蘇聯的建議是：建立一個真正的國際機構來監督和檢查原子能的生產；任何一個國家根據這個建議都保持着領土內的主權，都可以自由地發展並使用原子能於和平事業。同時對於誠實的管制必須沒有任何限制！蘇聯代表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一日的發言中，也着重地指出：蘇聯並不企圖隱瞞什麼，相反地蘇聯準備立刻將一切公諸於世；但是只有在一個條件之下才能這樣做，就是：原子武器不應再被使用，原子戰爭的威脅應當解除。

蘇聯的建議所引起的影響是有決定性的意義的。

關於這個原子問題，有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已經代表美國和西歐那些有理性的人們很清楚地把他們的意見表達出來了。他寫道：

“這個國家（指美國）關於原子問題作出了建議，但是它的建議所根據的一些條件是不可能被俄國接受的……因此，如果有誰要‘以拒絕國際監督’這個罪名來責難俄國的話，那麼，

有一件事實是不能漠視的，那就是：在‘國際監督’還沒有成為事實以前，我們自己也沒有自動地放棄在原子問題上的爭奪……。所以，我認為我們這種政策是錯誤的……；因為在我們的建議中，我們只提出由我們來儲藏及保管原子彈，而並沒有交代清楚我們首先有責任放棄原子彈的使用——那就是變成我們要藉保管原子彈的便利來達到政治目的……。如果說有人認為美國持有原子能壟斷權是一件有利的事情的話，那麼，假如有一天當美國失去了這個壟斷權的時候，情形就不是這樣了。到那時候，美國將因缺乏實際的國際監督的約束力量而受到很大的損失……”

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種評判是有遠見的。

那麼，那些“巴魯克計劃”的製訂者究竟怎樣來回答蘇聯外交方面所提出的忠誠建議呢？

接連着有五年多的工夫，他們費盡了精力，耍盡了手段；一直等到言窮詞盡的時候，終於無限期地停止了原子能委員會的工作。像這樣的情況曾發生過兩次：一次是在一九四八年的五月，另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七月。

但是，“巴魯克計劃”已經不可能再復活了。倫敦“泰晤士報”認為：“‘巴魯克計劃’已經是一具殭屍，完全是一個一敗塗地的計劃……。”這也正是美國“原子能壟斷”的夢想被吹得煙消雲散的時候。

三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恰恰就在隆重的莫斯科市蘇維埃會議上提出了第一次聲明的兩年以後，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同志宣佈：原子彈的秘密“早就不存在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塔斯社公佈：蘇聯在蘇維埃國

土上作了第一次原子彈試驗。

又過了兩年，一九五一年十月六日，又公佈一個消息說：在蘇聯又作了一次各種大小不同的原子彈的試驗。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塔斯社報道了關於幾種新型原子彈的試驗，並這樣說：“只要美國負責人繼續拒絕蘇聯一再提出的關於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議，那麼，蘇聯從安全的要求出發，不得不注意原子武器的生產。”

那些所謂原子戰略“專家”，也就是原子詭詐“專家”，對於這樣一些具有全世界歷史重要性的事件，將怎樣答覆呢？

有些頭腦清楚的人，對於已發生的事情認識得非常清楚；他們也能從這些事件中得出完全合理的結論。爲了舉例說明，讓我們引證一段演說詞。美國國會的聯合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斯·寇爾說：“蘇聯在原子能方面能達到這樣成功的地步，證明了蘇聯的科學家和技術工程師是有力量的，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現在我很鄭重地告訴你們：蘇聯是能够超越我們的。是的，他們一定有能力在短時期內超越我們的。……”再讓我們看看美國伊利諾斯州原子能試驗所顧問蔡茨所簽署的一個文件。這裏面寫道：“他們（俄國）正在以超過我們三倍的速度工作着……這是一件歷史上最大的、意想不到的事件。如果這種情況再繼續下去的話，那麼我們將要很快地失去我們的優越地位。……”

這種說法是有力的，也是正確的，但是還需要兩個重要的修改：“將失去我們的優越地位”應改爲“已經失去了我們的優越地位”，因爲當這個文件公佈的時候，已經不可能談什麼美國的優越地位了。第二，至於蔡茨所寫“意想不到的事件”，那只能在美國那些捧着文憑的書獃子們看來才是如此；因爲他們是無知的庸才，他們不懂得蘇維埃制度的特殊性，也不懂得

蘇聯人民的意志和品質，更不懂得蘇聯這種科學的偉大成就就是在怎麼樣的歷史基礎上達到的。

過去俄羅斯化學及物理方面的成就，對目前蘇聯的偉大功績曾經創造了條件。一八八八年，斯篤里托夫在莫斯科作了一個歷史上第一次的試驗，利用光的力量把組成原子外壳的微粒——即電子——從原子外壳分離開來。一九〇〇年，萊別特夫在莫斯科確定了質與能間比例的關係，這個發現對以後的核子反應是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的。它所以能够成功，是根據了門特雷業夫周期表；這周期表是核子化學的基礎，換一句話說，也是現代鈾反應器的基礎，從而製造出原子彈的炸藥和原子發電站的“燃料”。

那些草擬原子訛詐政策的人，決不能使人們忘記世界上的一件事實，就是：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間，在一個蘇聯的科學研究院內，世界上第一次根據中子在鈾中所起的作用，作出了核子分裂的鏈式反應，這個發現是曾經公佈了的。它有助於鈾核子自然分裂的發明，也有助於蘇聯在核子物理學年代中達到的成就，這些成就也是曾經公佈了的。

原子訛詐政策的鼓吹者，必須考慮到以上這一點以及其他一切事實。但是美國却忽視了歷史的教訓，而寧願走以前的老路。

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也就是塔斯社發出那個值得紀念的報道後的四個月，白宮即宣佈：他們已經開始了氫彈的製造。

四

美帝國主義這種蠻橫的“氫彈”戰略的投機和以前的“原子彈”不同（如果可以這樣劃分階段的話），因為一開始它就遭

到美國軍事科學工作者的尖銳指責。這些科學家是最有經驗的，並且其中一部分是被美國上層負責人認為在政治上是可靠的。這些科學家認為他們政府所作的決定是一個“無可挽救的錯誤”，是一個具有“災禍性的決定”，是一個“荒謬的把人類帶入深淵的政策”。既然他們有這樣的看法，那麼，他們依據的是什麼呢？

他們已首先看到了美國的這種氫彈競賽將給美國經濟、政治和戰略帶來一個黯淡的前途。

關於這個黯淡的前途，著名的英國科學家勃蘭凱特教授不久以前在他的“美國原子徬徨”論文中作了富有說服力的分析——該文載於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三日出版的“新政治家與民族”周刊。

勃蘭凱特寫道：“無論原子武器將來的前途如何，反正今天美國已不能再拿它作為實現其政策的外交工具了，這已成了事實……”

勃蘭凱特又寫道：“由於蘇聯的原子潛力，原子武器作為美國的一種戰爭工具，也在相當的程度上失去了它的作用而變為無能為力了。這也已成了事實……”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簡單的真理雖然被認識得很慢，但是無疑地，總會使那些美國原子事業的代表人物的頑固頭腦轉變過來，而願意接受現實。例如，華盛頓的原子能委員會前任主席迪安不久以前還在戰爭狂熱中揮舞着原子彈來恫嚇別人，現在也承認：在今天，要想認真地對這些原子彈抱有指望是不可能的了。他在最近的“原子能報告”中寫道：“在今天，原子武器這條路已經是走不通的死路”。他還說：“我們擔心：蘇聯的原子能生產將很快地破壞原子能作為戰爭工具的作用；這種擔心是有根據的……。”關於氫彈，他又特別指出：“專家們

中間，也有人開始懷疑氫彈究竟能起什麼真正的戰略作用……。”

這位“專家”所了解的所謂“真正的戰略作用”，就是指美帝國主義能否無法無天地把地面上的人類毀滅掉，把從事勞動創造的和平人民不是成萬地而是成百萬地毀滅掉。然而，這種“作用”也將很快地從美國戰略家手中消失。對於迪安，這是一件傷心的事。他把蘇聯人民及其科學的成就給人類帶來的生路和希望叫做“死路”。很難想像世間有比迪安先生給自己描繪出來的更為嚇人更為醜惡的漫畫了！

歷史的進程，體現在蘇聯人民在英勇勞動中的歷史進程顛撲不破的客觀規律，恰恰產生了美國有遠見的人們遠在幾年前就已猜想到的後果。

一九五三年八月八日，蘇聯政府的領袖馬林科夫同志，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五次常會上報告說：美國在氫彈的生產方面也已經不是壟斷者了。

同年八月二十日，蘇聯政府公報發表：蘇聯作了一種類型的氫彈的爆炸試驗。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赫魯曉夫同志在布拉格勞動人民大會上的演說中指出：蘇聯比誰都先製造出氫武器。

這一切有力地證明：美國想藉着原子訛詐和原子挑釁來阻止歷史前進的企圖，終於無可挽救地破產了。和平的事業，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事業，在蘇聯的保衛之下大大地鞏固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事業和冒險的實力政策遭受到同樣顯著的失敗。

一九五三年八月，美國統治集團面臨着一個新的局面，這個局面迫使他們必須採取一定的外交行動。艾森豪威爾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聲明就是這樣的一種

行動。

美國政府首腦七年半以來作了第一次這樣的聲明，在談到原子問題的時候，竟沒有提到“巴魯克計劃”。“巴魯克計劃”的挑釁計謀顯然已經破產了。關於這一點，連美國統治集團都不能不承認的。某些消息靈通的美國觀察家也曾強調指出這個事實，其中也包括“巴魯克計劃”的同謀者、工業家李連塞爾。他曾在芝加哥原子“公報”一九五四年一月號上就“蘇聯人在破壞巴魯克計劃時代(!)的努力方面所取得的無可懷疑的成功……”的問題嘮叨了一頓。艾森豪威爾在他演說中也間接承認了這一點。其中有一段，他讚美自己的“新建議”是怎樣的“不致引起惱怒及互相猜疑”，這新建議“連同過去的努力可能建立起一個大家能接受的國際檢查和國際監督的制度”。

新建議的內容究竟是些什麼呢？這個建議“一針見血”的要點便是創立國際原子“共儲”。這個制度規定每個擁有核子燃料的國家將從自己的原子儲備中捐獻出指定的一小部分作為共儲，其任務是在“世界上一些缺乏電力的地區內……”把原子能利用於工業。

最後，美國總統建議：立刻進行關於這個計劃的秘密談判，而且應首先和蘇聯談判。大家知道，蘇聯政府就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將一份備忘錄送交美國政府，表示完全同意進行這樣的談判。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蘇聯駐美大使查魯賓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華盛頓進行初次談判。以後莫洛托夫同志和杜勒斯又在柏林和日內瓦繼續進行了直接的會談。三月十四日，蘇聯收到美國方面的書面建議。四月二十七日，蘇聯政府又送出書面答覆。此後，關於這個問題又進行了兩次文件的交換：一次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另一次在七月十日。

蘇聯在這些會談中提出了清楚而明確的綱領：最大限度

地利用原子能於和平用途，把人類從原子戰爭的恐怖中挽救出來。

參加談判的對方所追求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種目的。

從艾森豪威爾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的建議中，我們在表面上所看到的是：關於“收集、儲存和保管”，關於撥出“某一小部分”核子燃料，讓國際原子“共儲”機構去支配使用。那麼，這個建議到底說明了些什麼呢？無非是：希望藉此探悉蘇聯究竟擁有多少原子儲備、原子生產的速度如何等等。這個建議最後預示：美國五角大樓的政治活動家可以藉着收集“一小部分”核子燃料這種國際機構的名義，在蘇聯國土上進行間諜活動。

老在這個問題上打圈子，美國的用心，已原形畢露了。

“紐約先驅論壇報”的政論家李普曼，在那些日子裏，曾十分明顯地暗示過：“新計劃可能達到的結果，就是老計劃所預計要達到的……”，那就是說：“從其他國家將自己的原子原料的剩餘供給國際機構的數量及供應的速度等等上，都可以看出這些國家的原子產量”等等。

這樣一來，“巴魯克計劃”，可以說沒有放棄。當然沒有！他們在這具遍體鱗傷的“巴魯克計劃”的屍體上，給蓋上了一條美麗的頭巾，把國際原子能卡特爾改成“國際共儲”的新名詞。其實，原子外交的推銷員企圖賣給蘇聯人民的還是那一套骯髒的東西。這是第一點。

第二，在蘇聯政府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答覆中，很清楚地強調指出：所謂“新建議”證明美國統治者仍企圖繼續原子武器及氫武器的競賽。蘇聯政府在聲明中又指出：艾森豪威爾的這個建議對於能够生產原子武器和氫武器的國家沒有任何約束力。這建議既不能制止原子武器的日益擴大的